

HAOXIANZU

朝鲜族研究论丛 2



YANJIULUNCONG

目 录

- 中国朝鲜族的历史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朴昌昱(1)
- 关于中国朝鲜族的地位与发展崔龙浩(27)
- 试论中国朝鲜族在历史上的法律地位问题权立(40)
- “九一八”前中国东北朝鲜族资产阶级反日民族
主义运动的思想探析姜龙范(61)
- 试论延边朝鲜族聚居区的形成孙春日(87)
- 试论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的朝鲜人移民政策···刘秉虎(108)
- 清朝、民国政府对延边朝鲜族人民的
统治政策.....黄今福(126)
- 清初著名的朝鲜族书画鉴藏家——安岐
——兼论《墨缘汇观》.....张昌熙(141)
- 中国朝鲜族历史上限新探.....范日(152)
- 朝鲜族迁入安图县初考.....车相勋(173)
- 图们海关简志.....金泰彦(191)
- 《北乡会》始末.....权哲(209)
- 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朝鲜族诗人申桢.....金东勋(220)
- 延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的系统分析
.....金奎方、李东进(238)
- 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发展、人口构成及其特点
.....金光世、朴养春(265)
- 当前中国朝鲜族教育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朴泰洙(266)
- 朝鲜族古典民俗舞蹈在安图县.....金晶勋(285)

中国朝鲜族的历史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

朴 昌 昱

(这是作者在1988年3月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举行的中国朝鲜族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的论文摘要)

中国朝鲜族是从朝鲜半岛迁入的“迁入”民族。朝鲜民族及其祖先到我国的历史，是从高句丽族在东北地区绝迹以后开始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元、明朝初期以前高丽人迁入时期①；第二时期，明末、清初朝鲜人迁入时期②；第三时期为清末至本世纪40年代。随着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前两个期迁入的高丽人或朝鲜人中，除了第二时期(明末、清初)迁入的朝鲜人中

①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在辽的中京道高州(现内蒙古赤峰东南)东京道归州等地，高丽人曾形成村落居住。在元朝，有几十万人口迁入到辽东一带。如在至顺年间(1330~1332)辽沈地区散居的高丽人有5,183户。他们主要居住在沈阳路的14个州(元史59卷，地理志沈阳路条)，据《高丽史》38卷，恭愍王三年十一月条，在燕京的高丽人有23,000余人。后因元亡明兴，高丽人大举归国。明初，洪武年间，在辽东高丽人3万，永乐年间漫散军4万。明在辽阳设“东宁卫”统辖他们。后随着东宁卫人口的增殖，朝鲜人散居于海州、盖州及东八站、凤城一带。

②参看：《朝鲜族研究论丛》“第一集”，“朝鲜族的迁入及历史上限”一文。

除极少数后裔尚保存一些朝鲜民族的民族特点之外^③，绝大多数已同化为他民族。在有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旧社会，一个民族无论被强行同化，还是自然同化，这是必然的历史现象。那么，第三时期迁入的朝鲜族为何至今仍圆满地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发展着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直至今天能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这对于研究朝鲜族历史及其迁入史，以及正确理解党的民族政策，都具有价值。由于笔者在《朝鲜族研究论丛》第一集中，已略述过明末清初以前迁入的历史概况，本文省略第一、二时期迁入的叙述，仅对清末以前和以后的迁入史进行对比，着重探讨现今朝鲜族能够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以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原因，请读者指正。

(一)

清末以后迁入的朝鲜族之所以能够保存并发展民族特征及其文化，是同他们的迁徙时间较晚(仅有120余年)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客观历史原因有二。

第一，他们所迁入的历史时代不同。如果说，元、明、清初是闭锁的封建时代，那么，清末以后则是世界已进入开化的近代时期。清初以前迁入的高丽人(或朝鲜人)，在封建闭锁的环境下，不仅与对外相隔绝，而且在他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被迫编入蒙、汉、满族籍，其大部分沦落为异民族封建王公显贵的家奴或农奴而丧失人身自由，遭受封建统治阶

^③参看同上书，河北青龙、辽宁本溪、盖县朴氏朝鲜族的社会历史调查。

级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对于这种被封闭于封建枷锁之中，丧失民族权利的一个少数民族（况且零星的散居在各地的）来说，当然谈不上民族自存意识的强化，谈不上反抗民族压迫的能动力。尽管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曾经为摆脱封建枷锁而挣扎过，然而，这些斗争毕竟是零散的和消极的。因此，他们只好忍吞民族压迫的悲痛，被迫同化于他民族。

与此相反，清末以后的世界已进入近代时期，欧美列强挂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幌子，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争夺商品原料市场，霸占殖民地。他们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开了古老的中国和朝鲜的封建大门。历史是辩证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惊醒了沉睡在漫长封建迷梦中的中国和朝鲜民族。中国和朝鲜的先知先觉者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西为中用”，以唤起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欧美列强的炮舰外交，尤其是日本的武装侵略，唤醒了朝鲜民族。他们开始掀起文化启蒙运动，以觉醒本民族的民族自存、自强意识。民族意识的焕发，是能够团结本民族、抗拒他民族的侵略，保持本民族的有力精神支柱。清末以后迁入的中国朝鲜族人民，曾经在朝鲜饱尝过民族的苦难。他们含着悲愤，渡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定居于我国东北。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他们的民族自存意识也日益强烈。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东北的朝鲜族聚居地区时，他们再也不甘心于“亡国奴”的处境，开展了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逐渐与东北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施加于朝鲜民族的民族灭亡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二，清末以后迁入的朝鲜族与以前迁入的移住民不同，他们迁入伊始在鸭绿江、图们江北岸逐渐形成起有一定

的本民族人口的、较稳定的民族聚居地区。众所周知，民族聚居区的存在，是能够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客观条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旧社会，本民族的聚居区是能保持并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抗拒他民族之各种要素的浸透，保障本民族的生存与延续的有力基地。尽管元、明时期所迁入的高丽人（或朝鲜人）也相对地聚居于辽阳、沈阳等辽东地区，但这些移住民被迫编入蒙、汉族籍，又被强征于军营，到处流动，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结果，只有老弱者留守在辽东。明末、清初的移住民也不例外，他们尽管在朝鲜已形成为朝鲜民族，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但是大多数是被掠夺而来，被迫编入于满族旗籍，辮发易服，或充当满洲八旗兵，或沦为清朝王公显贵之阿哈包衣而毫无民族自由^④。他们被征调到灭明战场，或被迫去镇压农民起义军，而经常分散流动于各地^⑤。因此，从未形成稳固的本民族聚居区。幸而河北省青龙、辽宁省本溪和盖县等地朴姓朝鲜族祖先，长期在一定地区作为当地开拓者而扎根务农，逐渐形成小村落。尽管是小村落，因为他们聚居，就能够保持本民族的起码特性。然而他们也毕竟生活在封闭的封建社会里，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下，在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联姻的过程中，无法抗拒他民族的各种要素的浸透。经过300多年的今天，他们的后裔已经丧失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仅仅保存着本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意识。

④据“八旗通志”，凡编入八旗兵的都入满洲旗，沦为农奴或农庄壮丁，也一律编入旗籍。包衣是满语即家奴的意思。

⑤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高丽佐领”记载，清军进关以后高丽佐领也跟随旗主，到山东、福建、四川、陕北等地镇压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而留在东北的除官庄壮丁，留守兵之外，几乎都进关。

与此相反，清末以来迁入的朝鲜族则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迁入伊始就在鸭绿江、图们江北岸的广阔地区聚居，随着本民族人口的增加，逐渐形成较稳固的民族聚居区，进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尽管他们也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的蹂躏，但是他们可以靠聚居的力量，为保存民族的生存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从朝鲜族聚居区的形成过程看来，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清末以来的迁人民不像元、明、清初时的移民那样被掠夺而来，而是因不堪李朝封建统治势力的横征暴敛和遭受各种灾荒而处于死亡线上的朝鲜穷民。他们不顾两国统治势力的封疆政策，“冒禁潜入”中国。这种“冒禁潜入”，自从清朝封禁两江北岸以后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在络绎不绝地进行。因此，19世纪中叶的大批迁入，是在此以前长期冒禁潜入的延续。

二是在聚居区里本民族人口日益增多，并且占优势。元、明、清初的高丽人（或朝鲜人）迁入以后，因国界被封，又无人身自由而与朝鲜半岛断绝往来的情况下，尽管人口自然繁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方面与他民族联姻、杂居中被同化，另一方面因社会动乱而流离不息，结果是人口日趋减少，直至绝迹。与此相反，清末以来迁入的朝鲜族则直至1945年的解放为止，一直与朝鲜半岛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来往。由于朝鲜和我国东北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都沦落为日本的“共同市场”和殖民地，人们的来往也通行无阻，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东北变成侵略大陆的兵站基地，推行朝鲜农民的移民政策，每年数以万计的朝鲜移民被迫迁入到东北的广阔地区。到1945年解放前夕，朝鲜族人口增

加到216万之多。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为我国朝鲜族人民保持和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包括中国朝鲜族在内的整个朝鲜民族推行恶毒的民族消灭政策，妄图把整个朝鲜民族同化成为日本大和民族脚下的一个支族，致使朝鲜民族濒临民族灭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民族为了生存和民族独立而进行了全民族性的抗战。在长期艰难的抗日斗争中，我国朝鲜族聚居区便成为东北各族人民和朝鲜民族的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基地，而朝鲜族聚居区也在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下越来越稳固起来。

四是随着东北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朝鲜族聚居区也发生了相对的变化。原来，在鸭绿江北岸的东边道地区，朝鲜族的迁入比延边早，朝鲜族人口也比延边多。不用说，明末、清初到19世纪初中叶，在东边道的边外北路地区有数千朝鲜族已定居务农。1897年东边道的朝鲜族人口增加到37,000余人，而1894年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只有20,846人。^⑥然而，自从本世纪一十年代开始，东边道的朝鲜族不断地内迁到东北腹地或北满，致使该地朝鲜族人口逐渐减少。与此相反，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却日益增多。结果，今天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区不是东边道，而是延边地区，下边参看东北朝鲜族人口的累年统计表：

^⑥朝鲜总督府：《在满朝鲜人概况》，1936年版，《东三省政略》边务4，第二章。

东北朝鲜族人口与延边、东边道朝鲜族人口的累年比较表⑦

类 年 别 度	东北朝鲜 族总人口 数(名)	延边朝鲜族 总人口数		东边道朝鲜族 总人口数		备 注
		人 数	对总人口 的比率	人口数	对总人口 的比率	
1922	515 865	323 806	62.7%	95 780	18.6%	东边道的统计为1924年的
1930	607 119	382 405	63.0			
1936	854 411	474 333	55.6	85 328	10.1	
1939	1065 523	529 193	49.7	130 526	12.2	
1944	1658 572	631 733	38.0	181 379	10.9	
1949	110 657	529 000	47.6	129 135	11.6	

延边朝鲜族人口累年统计表⑧

类 年 别 表	延边总人 口数(名)	朝鲜族人口数		备 注
		人口数 (名)	对总人口 的比率	
1910	143 000	109 500	76.6	牛丸闰亮等《最近间岛事情》参考
1922	394 504	323 806	82.2	同上书
1929	501 862	382 405	76.2	同上书
1934	594 780	426 681	71.7	伪间岛省1943年《统计年表》参考
1943	866 061	635 643	73.3	同上书
1949	835 278	529 000	63.3	《国民经济主要统计资料》参考

⑦解放前至1939年的统计，摘自《满洲年鉴》1937、1941、1942年版。1944年之统计摘自国民党东北行辕：《东北经济小丛书》纤维工业篇1947年版。解放后之1949年之统计，摘自东北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处1950年《各种统计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延边为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四个县，“九一八”事变后至1949年是在上述四个县加上安图县计五个县。东边道指的是现通化、丹东地区的长白、临江、集安、通化、桓仁、宽甸、安东和凤城等八个县。

⑧“九一八”以前的延边为延吉、和龙、汪清和珲春四个县；1934年至1949年为上述四个县加安图县。

上述统计表明，东边道的朝鲜族人口直到1931年“9.18”事变，从未超过过10万，反而曾一度减少到8万。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猖狂推行殖民地移民政策的情况下，到1944年才增加到18万。与此相反，延边的朝鲜族人口则一直在增加，并且在延边总人口中一直占多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东边道地区土地贫瘠，加上在边外南路的安东、凤城、宽甸等暖阳门以西之地，很早以前开放，汉、满族早已定住。朝鲜族则在迁入初期多从渡江方便、监视薄弱的鸭绿江上游潜入到山高陡峭的边外北路之长白、辑安、临江等地定居。^⑨当清朝废除封禁时，在辽东的汉族移民象洪水般地迁入到该地，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因此，后来迁入此地的朝鲜族则难以立足，即使早先迁入者也便于生活而向内地迁走。尤其是1911年日帝把安奉铁路改筑为宽轨，并架设鸭绿江铁桥，与朝鲜铁路连结后，从鸭绿江方面迁入的朝鲜族移民，通过安奉铁路，多半着落于土地肥沃、适合水田耕作的辽河平原地区。后来(1939年)集梅铁路开通后则一部分朝鲜族移民迁入到吉海地区^⑩很少滞留东边道边外地区(除1933年开始的集团移民外)。与此相反，延边地区不仅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并且由于地处三国交界，接壤沙俄。清朝为了“移民实边”，不得不允许朝鲜族垦民的居住和土地耕作。这样，大批朝鲜族农民络绎不绝地迁入到延边地区，人口日益增多。

从政治方面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之加剧，在奉系军阀的据点——南满地区，日中矛盾也日益尖锐

^⑨参看崔宗范：《江北日记》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1979年59期。

^⑩集梅铁路是于1939年修筑，从集安到梅河口，南接朝鲜之北鲜铁路，北接吉海铁路。

化。奉系军阀既慑于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又不敢触动日帝。他们把朝鲜族移民的增加，以及他们的反日运动歪曲成为“引起中日外交纠纷”，“引入日本军”之“祸根”。结果，他们不仅镇压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斗争，而且不许朝鲜族享受有土地所有权，连他们的租地权也百般加以限制，进而采取迫害，驱逐朝鲜族的政策^①。于是，南满的许多朝鲜族，不得不迁入到土地肥沃，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北满、西满地区。延边地区就有所不同。在这里中日矛盾虽尖锐，但朝鲜族占人口的多数，而且他们首当其冲地进行反日运动。对此，吉林当局则时而同情，时而袖手旁观，甚至采取争取朝鲜族的一些措施，从未象南满地区一样公开驱逐过朝鲜族。因而，朝鲜族越来越集中于延边。随之、延边聚居区也越来越扩大，越来越稳固起来。

总之，我国的朝鲜族所以能够保持本民族及其民族文化，是同有着能够凝聚本民族，抗拒他民族浸透的客观实体——民族聚居地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象延边那样的稳固的民族聚居区，就很难想象有朝鲜族的今天。

(二)

中国朝鲜族之所以能够保持本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并且能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其主观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同兄弟民族一道，开拓和建设了东北边疆，成为东北大地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主人翁。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迁入的朝鲜族人

^①奉天当局的迫害，驱逐朝鲜族的政策与日帝对朝鲜族的“统制与利用”政策有关，这种政策的推行在1925年6月签订《三矢协定》以后开始更加公开，到1927年成为“高潮”。

民，用自己的血汗把荒废数百年的东北边疆，一垅一块地开拓了起来。由于清朝对于长白山以北千余里之地，实行200余年的封禁，“南荒围场”——延边、“东边围场”——东边道，都变成大树蔽天，野兽出没之地。朝鲜族迁入以后，披荆斩棘，刨地开荒，把荒凉的空旷地变为五谷丰登的良田。据1881年琿春招垦局的调查，延边的熟地面积已达27 815垧^⑬。1907年和龙峪管辖的汉、满族人口为264户，朝鲜族人口为5 990户，耕地达25 501垧5亩2分^⑭。又据1903年朝鲜西边界管理使徐相懋的调查，在长白府、临江县、辑安县、通化县、怀仁县、宽甸县和安东县等地32个朝鲜族聚居村的户数达6 357户，人口55 593人^⑮。这一切足以说明朝鲜族人民是一名符其实的东北边疆的开拓者。

特别是在近代东北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水田开发，首先应归功于朝鲜族农民。早在1846年左右，朝鲜族农民沿着浑江而上，到宽甸的下漏河、太平哨一带试种水田。1861年，安东的三道浪头地区的朝鲜族农民也挖掘水沟，引水开水田^⑯。到1875年，往来于浑江一带的朝鲜族筏木工在桓仁(当时属于通化)的下甸子定居，开发水田^⑰。自1890年到本世纪初，汤山城(安东)、熊岳的张家屯、抚顺的蒲家屯、松树镇等地的汉族地主也看到了水田耕作的效益，招来朝鲜族农民开发水田。这样，到本世纪初，水田耕作广泛地

⑬《吉林通志》第31卷上。

⑭《东三省政略》边务4，第四章。

⑮高永一：《中国朝鲜族研究》121页，延边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⑯韩桂华：《在安东省的朝鲜人移民调查》满洲农产公社总务部《在满洲之大米经济发达过程》1942年11月。

⑰满洲农学会：《满洲之水稻耕作研究》4页1940年版。

波及到通化、柳河、兴京(新宾)、安东等地区。1908年左右则波及到沈阳地区^①。奉天当局于1912—1914年设立奉天水利局,挖水渠,引来浑河水,在奉天、新民一带之北陵、塔湾和公太堡等地广开水田^②。还颁布奖励水田耕作的章程,以资鼓励。从此,辽沈地区的汉族地主纷纷招来朝鲜族农民广开水田。在迁入初期以旱田耕作为主的延边地区,也从1890年左右起试种水田,到了1910年代已广泛波及到海兰江、布尔哈通河、嘎呀河和密江流域,延边的平岗平原成为盛名于东三省的著名水田地区。朝鲜族农民在北满的水田耕作也较早。据传,本世纪初从西伯利亚迁移到黑龙江地区的朝鲜族,在庆安一带已经试种水田。1911—1914年,水田沿着绥芬河、穆稜河流域发展,继而波及到蚂蚁河、东亮子河流域。这样,到了1920年代,由于朝鲜族农民的辛勤劳动,水田耕作波及到全东北的大小河流之两岸。可以说,朝鲜族农民所到之处,便是水稻生根开花之地。1921年,全东北的水田耕作面积达48,911公顷,1923年则猛增为125,81公顷,1944年已达326,311公顷^③。

原来,东北的古代水田耕作,自从古代渤海国灭亡之后便绝迹。到了近代,由于朝鲜族农民大批地迁入到东北,才重新开发出来。水田耕作的发展,不仅对东北农业结构的改变和农业产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把荒废了的涝洼地和草甸地也改作为良田,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东北土地

^①满铁兴农部农业课:《满洲之水田》3页,1926年版。

^②奉天水利局据“奉天通志”卷108 水利 24页为1914年设立,但别的书里则1912年设立。本文根据《奉天通志》为准。

^③东北物质调节委员会:《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业生产篇95页,1947年版

的耕作率。随着大米产量的增长，促进了大米的商品化过程。大米同大豆、小米一样，成为主要农业商品，出口到朝鲜、日本等地。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浸透于朝鲜族农村，加快了大米的商品化过程。到1920年代后期，大米总产量的75%左右变为商品粮^②。

朝鲜族农民还把水田耕作技术传授给了兄弟民族。1920年代初，在辽东的复州河，大沙河和庄河流域的汉、满族农民也广开水田。这不仅为扩大水田面积，发展水田耕作技术具有巨大意义，而且在与兄弟民族之间交流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过程中，逐渐结成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使朝鲜族人民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我国朝鲜族所以能够保持本民族的生存，取得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另一个主观原因，是他们与兄弟民族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迁入初期，朝鲜族人民就为反对清朝统治势力的“薙髮易服，归化入籍(满洲籍)”，反对封禁制度等，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1907年8月，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口“间岛所属久未解决”，打着“保护”朝鲜人的旗帜，把侵略魔爪伸向延边，设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干涉中国内政，猖狂进行侵略活动时，朝鲜族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延边，在各地处死亲日走狗和暗探，反对日帝所策划的“都社长制”，拒绝

^②李助求：《满洲与朝鲜人》179页。1931年 平壤版

他们的纳税要求。1909年日本与清朝签订“间岛协约”，对朝鲜族人民推行“领事裁判权”时，朝鲜族人民掀起反对“间岛协约”的斗争。1912年，当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订“吉会铁路修筑借款合同”时，在延边和吉林的朝鲜族学生同兄弟民族学生一道，展开了反对卖国协定的集会、示威运动。

1919年4月到5月，全东北的朝鲜族人民掀起了以龙井的“4·19”反日大示威运动为代表的广泛的反日运动热潮。接着又组织反日武装团体，不断地袭击中朝边境地区的日本军警哨所，打击了日本侵略者^①。在1920年6月的“凤梧洞战斗”和同年10月的“青山里战役”中，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有力地打击了进犯东满地区，妄图“剿讨”反日武装团体的以日本第19师团为主力的2万余日本侵略军^②。这次“间岛事变”（即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侵略者兽行大发，施以野蛮的三光政策，烧毁朝鲜族民屋2500余栋和30余所学校，还逮捕和杀害了数以万计的朝鲜族群众^③。但是，朝鲜族反日部队并未被吓倒，他们先后成立“正义府”、“参议府”和“新民府”，继续派遣武装小分队，袭击日帝军警，处决亲日走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据统计，1920—1927年各反日武装团体在中朝边境一带，共出击2929次^④。

^①据1920年10月2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高警第34,318号文件，1919年下半年起各反日武装队伍纷纷袭击驻朝鲜边境的日军。洪范图所率领的部队，还过鸭绿江，袭击滋江、江界等地。在滋城激战三天，歼敌7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各反日部队在中朝边界一带出没1631人次。1920年3月，延边反日部队分数路八次袭击朝鲜稳城一带。

^②参看姜德相等编：《现代史资料》第28卷287～291页，东京三铃书房版。

^③参看：《吉长日报》1920年11月10日和11月19日。

^④姜东镇：《日本对朝鲜支配政策史研究》292页。

1920年代初期开始，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学说广泛地传布于朝鲜族聚居地区。这一新时代的思潮，促使朝鲜族人民用“劳农革命”的锐利武器，总结过去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从此，朝鲜族的斗争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到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朝鲜族人民在早期共产主义团体或中共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日斗争浪潮。仅1930年一年里，延边地区朝鲜族群众就发动684次反日反封建暴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势力。1930年6月—1931年2月间，在延边地区被捕或杀害的朝鲜族反日革命战士就达2 295人^②。

被派遣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朝鲜族先进分子，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难免总是伴随失误的。东北地区朝鲜族的革命斗争，直至1930年，围绕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的相互联系、中国朝鲜族人民所应采取的具体战略、结成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过一些失误。当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北社会，朝鲜族人民不仅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遭受封建地主势力的残酷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只反日而不反对封建势力，不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就必然脱离大多数人民；要战胜强大的内外敌人，不能只靠占东北总人口的3~4%的朝鲜族人民，而必

参看姜德相等：《现代史资料》30卷627页。东京，三铃书房。

须与占人口多数的东北各族人民，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并肩战斗。这些斗争根据中日矛盾的变化、发展动向，既要广泛团结反日民主力量，又要对地方政权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从1930年春天起，朝鲜族人民的先进分子遵照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陆续加入了中共党组织。从此，朝鲜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明确的方向。第一，朝鲜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具体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相互联系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促进朝鲜独立和革命进程的一份力量。所以，包括到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朝鲜同志在内的朝鲜族人民，必须直接投入于中国革命。这不仅为了中国革命，实际上也是为着朝鲜的独立和解放，把中朝两国的革命统一起来了。第二，朝鲜族人民同兄弟民族一道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也不仅是为着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是为着整个朝鲜民族的解放。从此，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起了“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旗帜。当然，作为中国朝鲜族人民来说，从前所举的“为朝鲜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旗帜中包含着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内涵，而当今所举的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旗帜中也包含着为朝鲜民族的解放”的内涵。这就是中国朝鲜族所肩负的“一身兼二任”的使命。这是朝鲜族人民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

1930年5月起，东三省朝鲜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斗争”、“五卅暴动”、“八一吉敦暴动”和“秋收暴动”。在斗争中，朝鲜族人民在汪清罗子沟、和龙药水洞、敦额、宁安和柳河等地先后成立了“红色游击